

市场化出版与民族书写的张力：《尘埃落定》藏族原乡的当代文化想象

郑哲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河北石家庄，050000；

摘要：本文将从《尘埃落定》中对汉文化与藏文化的创作元素出发，探究身为多民族混血特质的作家阿来的少数民族创作特点。不论是对藏文化还是汉文化的书写，小说中真正传递出来的力量则是阿来对于文化的一种开放观念，以及在坦然接受客观变化基础之上进而对人生、宗教、存在等人类普遍问题的思考。阿来的《尘埃落定》通过市场化出版突破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壁垒，其创作重点并非在于对藏文化还是汉文化的描写，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汉藏文化交融的创作方式和手法，表达自己对藏文化的眷恋以及对现代化、世道变迁、现代化进程、人性中的欲望等问题的关照。

关键词：市场化出版；民族书写；文化想象

DOI：10.69979/3029-2700.25.11.029

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在开合之间展示了“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阿来正是以某种神奇而抒情的方式，展开了藏地生态的现代史诗化——民族与国家、传统与现代在其中碰撞交汇，浸泡于“轻巧而富有魅力”的诗意语言之中：^[1]

《尘埃落定》讲述了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麦琪土司一家的故事。老麦琪土司的两个儿子——大少爷英武彪悍、聪明勇敢，被视为当然的土司继承人；二少爷天生愚钝、憨痴冥鲁，很早就被排除在权力继承之外。麦琪土司的土地上逐渐出现了现代化的事物：罂粟、鸦片、现代武器和军队……很快，藏地各个土司之间的矛盾加剧，世道变了。傻子二少爷逐渐展现其大智若愚的特质——逐步建立了税收体制，开办了钱庄，在古老封闭的阿坝地区第一次出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雏型……从而一场家庭内部聪明的大少爷和傻瓜二少爷关于继承权的腥风血雨又悄然拉开了帷幕。终于，在解放军进剿国民党残部的隆隆炮声中，土司制度也随之瓦解……

阿来曾这样称自己：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从《尘埃落定》文本创作来看，故事讲述的是藏族地区麦其土司一家的衰亡，或者说是藏地土司制度的衰亡。作品中大量对藏族风土人情的描写使得整个作品充满了少数民族的情调，但是细读会发现，这并不是一部以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作品。小说中蕴含著作者阿来的人文关怀，对故乡的追忆，对宗教、人生等普遍人

类生存问题的思考。

1 《尘埃落定》的藏族叙事

对于藏族，读者的普遍感受就是神秘的、神圣的。藏区独特的土司制度以及藏族独有的民间文化与信仰均让读者好奇并向往。这些因素在阿来《尘埃落定》中均有详细的描述与书写。关于这个在封建王朝帝王为解决西南少数民族边境问题的民族政策，小说第一章则有关藏族土司制度的描写，关于权力、关于地位、关于身份：

骨头把人分出高下。土司。土司下面是头人。头人管百姓。然后才是科巴（信差而不是信使），然后是家奴。这之外，还有一类地位可以随时变化的人。他们是僧侣、手艺人、巫师、说唱艺人。对这一类人，土司对他们要放纵一些，前提是只要他们不叫土司产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好的感觉就行了。^[2]

这段描写不仅向读者简洁明了地阐述了处于川藏边界嘉绒地区藏族土司制度的形态，同时将整部小说的文化基调定于藏族土司制度文化环境中的麦其土司家族的荣辱兴衰，充满了藏族情调，这种文化笔调也带给广大汉族读者一种异族新奇的阅读体验。

当藏族作家阿来带着其笔下的《尘埃落定》进入广大读者视野的时候，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其异族性——浓郁的藏族风情与文化，给读者带来很新鲜的阅读体验，同时打开了读者了解和感受藏族的客观渠道。但笔者想阐述的观点是，对于藏族元素的写作，阿来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怀旧书写进行写作，而是通过这样民族风情的

创作去感受特定政治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存在和消失这样一种变化的过程。曾经多么辉煌的麦其土司一家阻挡不住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充斥,传统的事物中总有一部分在文化交融中会灭亡、消失。阿来关注着这种变化和消失,以一种接受的态度面对它并思考,历史进程是没有人可以阻止的,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阿来采取交流的方式去看。而对于藏族宗教的大量描写可以视为阿来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增添了小说的神秘化叙事色彩,以一种解释不清的力量对某些自己想要表达观点的一种掩盖,这一点后文会有所阐述。因此,我们关注文本藏族叙事的同时,更应该看到作家阿来的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和对历史进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改变的一种积极思考。

2《尘埃落定》的汉文化写作

提到《尘埃落定》,令广大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人物形象非傻子二少爷莫属,奇怪的是,对于这位麦其土司家族的二少爷,读者从始至终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很习惯得称他为二少爷或者直接称其为傻子,但也就是这个没有名字却又生动形象的人物个性很鲜活存在着。身为土司家族的少爷,没有对于身份、地位的明显定义,相反其身上的这种傻乎乎的劲头使得人类最本真的善良和真实显现出来。傻子二少爷没有把土司家族看中的「骨头」放在心上,也不会将下人当作是自己的牲畜一样对待,见到饥饿的百姓不会因为这些百姓不是自己的子民而吝啬自己的善良。因此身为少爷却体恤下人、善待下人、且拥有中庸的思想观念使得傻子在复杂激烈的权力争夺中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从而,他的这种傻,实际上却是一种保持自我、保全自我的聪明人的做法。傻子二少爷的言行举止恰恰和汉地推崇的儒道观有不谋而合之处。

傻子二少爷身上彰显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庸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它是儒家尤为提倡的^[3]。学者田由申对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做了如下解释:

我们现在说中庸,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做事,不偏不倚的才叫做中,不改变的叫中庸。行中,这是天下的正道;用中道,这是天下的真理。中庸的基本要义,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为人处事、持家治国等人生作为,都充分体现了这个道理。^[3]

傻子身上的中庸思想在与麦其土司家的大少爷相比较就尤为突出了。身为麦其土司将来两大继承者——聪明强干的大少爷和傻子二少爷,二人为人处事以及兴趣取向完全不同。大少爷一直为将来继承麦其土司位置做着努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为麦其土司家带来无尽的荣誉,展现着新一代英雄的魅力;傻子二少爷则整天傻

乎乎的,想的念的都是画眉鸟、侍女桑吉卓玛。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麦其家新一任土司必为勇猛的大少爷所属,但是随着汉区引进的现代化枪炮和鸦片对藏区的充斥,大少爷的野心和欲望被不断激发。小说中也说到麦其家的大少爷最爱两样东西:枪和女人,这种无节制的欲望喷张使得大少爷不断走向一种极端。相反,二少爷审时度势,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世道做出自己的决定,无论是建议土司为百姓减免赋税,还是在鸦片种植为家族制造大量财富后提出改种植粮食的建议,亦或是将哥哥在边界建立起来的御敌堡垒改造成开放的市场,事实证明这些决策的正确。而哥哥从始至终一直采取战争的手段解决一切问题,殊不知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野蛮文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正是傻子二少爷身上的这种时傻时聪明的不断变化使得在张弛之间透露出来某种神秘的力量感和智慧感^[3]。

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不仅体现在治国之道上,也体现在二少爷处世哲学中。从小到大自己与哥哥的关系一直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傻、他的不争,这种不争的思想恰恰是道家所提倡的。道家的不争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不争之争的策略:“老子之所以提倡这种不争之争,就是因为越是表面强势的人,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越容易被对手打败,最终越是争不到。”因此,道家认为不争的态度是一种为人处事的大智慧。我们不能说因为傻子二少爷深知这种处世哲学而选择这么做,而是说傻子身上的本真和善良使其行为暗合了儒家与道家的这些思想,恰恰达到了道家所说的以柔克刚的境界。

我们看到,二少爷身上的儒道观让自己成为土司家族的边缘人物,因此得以保全自身,让他有机会去看见一些事情,甚至预见土司家族的灭亡。而后在关键的情节上,他的这种儒道观又衍生成一种内在力量的智慧涌现。这个离经叛道的傻子会时常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这种情怀关乎百姓、关乎人类的生存,而这一切在土司家族其他成员的眼里是幼稚的、可笑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尽是对权力的争夺、对地位的欲望。也正因如此,傻子的傻才那么珍贵,同时也那么讽刺。

3 市场化出版: 透过文化寻找人类生存普遍性

第一次阅读阿来的《尘埃落定》,笔者确实被小说中这种奇异、特别的藏族味道所吸引。然而通过不断反复的阅读,一种普遍的阅读感受便会升腾出来。这种普遍无关族别,更无关宗教,而是一种对于人性、人类生存的普遍关注和思考,这也正是作家阿来的普遍关照和思考以及带给广大读者的一场精彩的精神洗礼。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阿来的这种对人性普遍性的把握与他开放的文化观是紧密相连的,两者互为因果。

上文提到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描写有关宗教的情节,而这种对于宗教的描写无关乎信仰,只是在描述浓厚的藏文化氛围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小说整体增添了一种神秘、神圣之感。在阅读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麦其土司家所在的藏区对于宗教的信仰其实是很弱的,如果说从阿来到土司家族都对宗教信仰持有很弱的崇尚感的话,那么文中常常被描写到的一种令人心生畏惧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笔者将它归纳为一种自然力。令人敬畏的来自自然,这种对自然力的信仰和敬畏不仅仅适用于藏族人民,更是包括汉族人民的普遍人类所信仰的。对于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然力的崇尚,阿来本人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

前些天,我在一座城市和我一本小说的翻译交谈,这位生长于异国大都会的学者有些歉疚,但还是直率地告诉我,他无法真正理解我对自然界神一般的崇奉之感。我告诉他其实我也不太懂得。最后,是他给了一个什么都不说明但又什么都可以说明的答案。他说:也许是血液里的东西吧^[4]

这也就是作家阿来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将融进血液的东西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即使描写的是有异于汉族文化的边缘文化,也与读者产生一定共鸣。阿来描写的确实是藏文化,也是汉文化,而他的关注点并没有局限于汉藏文化及其相互交融之中,而是将视角放在人类普遍生存问题之上,这种思考关乎宗教、关乎人性、关乎人类生存、关乎历史变迁中的现代化进程。

《尘埃落定》的市场化出版之所以能突破民族文学的传播边界,本质在于阿来以藏族原乡为切口,在独特的文化肌理中挖掘出穿透文明壁垒的人类生存寓言。当小说借助商业出版的羽翼飞向更广阔的阅读市场时,那些包裹在土司制度、藏地风情、宗教预言下的叙事内核——权力更迭中的身份困惑、文明碰撞中的价值迷失、现代性浪潮中的传统裂变——逐渐显影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镜像。傻子少爷作为藏族世袭制度的“他者”,其混沌又澄明的认知视角,不仅是对藏族文化中“智慧”“愚昧”二元观的解构,更成为观照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棱镜:当我们在麦其土司官寨的兴衰中看到权力异化的循环,在藏族农奴与汉族商人的博弈中读到资本逻辑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在活佛预言与傻子“先知”的对峙中察觉信仰体系的崩塌与重构,这些根植于特定文化土壤的故事,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限定,指向人类在历史洪流中永恒的精神母题——我们如何在文明的碰撞中确认自我?当旧秩序崩塌时,个体该以何种姿态迎接未知?文化的独特性在此成为通向普遍性的密码,而市场化出版则扮演了破译密码的媒介:它让藏族土司的

故事登上全国性的文学舞台,使藏地文明的褶皱在更广阔的文化坐标系中展开,让不同背景的读者在“麦其粮仓的罂粟花”与“官寨的酥油灯”里,看见自己文明中相似的挣扎与觉醒。这种从文化特殊性到人类普遍性的升华,正是《尘埃落定》在市场化浪潮中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关键——它证明,真正深刻的民族书写从来都是人类精神的方言版,当商业出版拆除文化传播的藩篱,那些蛰伏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生存智慧,终将在更辽阔的文明对话中焕发新的光芒。

4 结论

阿来将藏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使得外族人客观认识和了解一个真实、去神化的藏族,阿来笔下的藏族世界与外族人通常以为的藏族不同,这里宗教、朝圣、拉萨并没有占据小说内容、精神的主体部分,反而通过麦其土司一家的生活进行描写。同时阿来采用汉语讲述藏区麦其土司一家的荣辱兴衰,将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写作方法吸引了大量读者。在读者体会藏族土司制度一点一点土崩瓦解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体会到作家阿来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尘埃落定》的出版和畅销也向我们揭示了当代民族书写的典型困境:市场化既是传播的机遇,也是文化失真的风险源。阿来的创作实践证明,突破这一张力的关键在于拒绝将民族文化简化为市场卖点,以历史化、复杂化的叙事呈现其内部多样性;出版社需在商业逻辑中保留文化敬畏,通过对文本的深度注释、跨媒介知识生产等方式提升民族文学的阐释空间;将民族文学视为理解多元文化的认知工具。

参考文献

- [1]陈晓明,陈欣瑶。历史的衰败与虚化的叙事——阿来的《尘埃落定》及其小说艺术[C]//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1.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53.
- [2]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上的演讲[C]//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52.
- [3]田由申。儒家思想与道家精髓[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1:44-51.
- [4]杨献平主编。笔尖下的西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6.

作者简介姓名:郑哲(1992.01.19—),性别:女,籍贯:河北石家庄,民族:汉,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出版与文学。